

胡适：

# 思想的先驱，革命的弃儿

## “逼上梁山”参加文学革命

拥有这样丰厚委婉性子的人，却在当时被称为民主与科学革命的执牛耳者。然而，在这场浩浩荡荡的文学革命中，与其说胡适是主动投身，倒不如说是被“逼上梁山”。

在新文化运动前，胡适对于民主和科学的意识，已经有了很深厚的积淀。由于母亲多花了两倍的价钱，在私塾读书的胡适，才有了先生为其将古文讲解为白话的“特权”，这让他觉得，用白话或口语写成的东西，既易了解，又有引人入胜的趣味。

1916年，他的好友，也就是后来的北京政府教育部教育司司长任鸿隽，将一首《泛湖纪事》诗寄给胡适，却遭到了胡适的极力批评。胡适说，全诗用的是早已死去的文字，提出要在诗歌中去死求生。这遭到了当时同在美国留学的任鸿隽和梅光迪的讽刺与反对，并且为大部分留美学生排斥。

自觉被孤立弱势的胡适，才知道自己的主张有巨大的障碍。再加上此时国内的《新青年》已经举起了“新潮”的大旗，他丢下一句：“要前空千古，下开百世，收他臭腐，还我神奇。”义无反顾地回国，“被逼上梁山”，以一篇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开始了他的白话文学革命。

然而，他终究想错了。革命和他的理想，并不完全是一回事。书斋里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只是一篇理论文章，再精彩也不可能有多大的影响力，革命不是白纸黑字就能解决的。

胡适承认，正是由于陈独秀、钱玄同等人“三大主义”、“十八妖魔”、“桐城谬种”等充满火药味的口号，以及“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”的武断，才能推动文学革命迅速展开。已经扛上“文学革命”大旗的胡适，没有选择的余地。

新文化运动的如火如荼，与他行事谨慎的宽容性格逐渐相悖。后来，

在20世纪20年代，林语堂在他主办的《论语》杂志上宣布：“这本杂志的作者，谁也不许开口‘我的朋友胡适之’，闭口‘我的朋友胡适之’。”当时的人们都以跟胡适做朋友为荣，而胡适为人宽厚、谦和温润的性子，是其幸，也是不幸。

本报记者 陈玮

【胡适】



扫码看视频——对话胡适



记者：胡先生，以前看您天天在朋友圈里晒饭局，现在怎么都删除了？

胡适：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啊！有一次在饭局上喝多了，随口以蒋公独裁为题即兴来了段英文演讲，不承想被人录下来，上传到因特网，还私信给了蒋介石，结果被查了水表，封了号。做人难，做名人难，做名男神更是难上加难啊……

他也在不断修正《尝试集》，到最后坦然宣布“我近年只做我自己的诗”，而不再力不从心地扮演“领路人”的角色。并开始研读旧诗词，变换韵脚而获得写作的自由。

但是，他的文学革命是成功的，很快，北洋政府下令，中小学教材统一使用白话文。由此看来，他的理想实现了，可是真的是这样吗？

很多年以后，当胡适回忆起这段让他名声大噪的往事，不禁多了一份理性：北洋政府是大家认为最保守、最顽固的坏政府，竟这样支持白话文，原因是因为我们正处在那个再造文明的时期。当时最支持白话文运动的主要是知识青年，他们论古文根底不行，论西学又是半桶水，所以白话文是他们力争上游的最佳工具，总算能跟过去占据庙堂的精英一较高下。但是他们真的爱吗？不一定。

他终究没有想通很多问题，于是很快离开了《新青年》，然而，促使他离开的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。

## 过河卒子，如何适之

很多年后，当新文化运动成为一段往事，女作家苏雪林找到胡适，希望备受鲁迅讥讽的胡适，支持她发起对鲁迅的总攻击。但是胡适却在回信中表彰了鲁迅的功绩，婉拒了苏雪林的请求。

新文化运动后期，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合，当时在一个战壕中破除传统文化的战友，却成了分庭抗礼的对手。

后来，胡适与《新青年》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论战，那就是“问题与主义”之争。“五四”以后，十月革命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成为主流，然而胡适信奉的是实用主义，主张一点一滴地进行改良，而不是大刀阔斧的搞革命。但是，他的看法很快被当时激进的社会声音淹没了。他们的辩论以《每周评论》被查封而终结，因为不够

激进，他逐渐被边缘化，而胡适也正式与《新青年》分道扬镳。

在两件事情上，胡适是绝对不会让步的，那就是个人自由以及实用主义，而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的政治悲剧。比如，日本提出有名的对华二十一条条件，当时中国人都赞成立即与日本开战。胡适则写了一封公开信，劝告处之以温和，持之以冷静。在当时，他被骂为卖国贼。后人评说，胡适是政治面前的缩头乌龟，其实不然，只是所信奉的主义不同罢了。

说实话，胡适是有些功利心的。在美国，他四处演说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，俨然成为一位活动家，而脱离《新青年》后，他虽远离政治，却成为蒋介石的驻美大使。多次离开国民政府，又多次重回政治漩涡，都流露出他内心的不甘心。

最后，因为追求自由，他还是与蒋介石决裂。1951年随蒋介石回到台湾后，他公开对台湾政治现状发表讲话：言论自由，只在宪法上提一条是不够的，还要我们自己去争取。这彻底激怒了蒋介石父子。

无论怎样，胡适的思想与当时的政治，永远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。最后他回到整理国故的考证上，专心做回了研究者。在他看来，他的实用主义在政治上实现不了，就在学术上完成。最后胡适以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身份，离开了给予他功与名，又让他充满了失意的世界。

季羨林曾有一句话形容胡适：我觉得，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，一个怪圈中：一方面是学术研究，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。他一生忙忙碌碌，惶惶奔波，作为一个“过河卒子”，勇往直前，我不知道，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。他的好友唐德刚的看法更为直接：他的“治学”不能支持他政治思想的发展，这样的治学方法或许限制了胡适，使他在学术上与政治上无法取得更耀眼的成就。

# 北大的“新青年”们

(上接B01版)

1918年3月，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，钱玄同跟刘半农俩人上演了一出“双簧”。钱玄同化名“王敬轩”，写了《文学革命之反响》一文，狂骂新文化运动。而刘半农写了上万字的《复王敬轩书》，一一骂了回去。在这俩人的自导自演中，翻译家林纾躺枪，成了两人对骂的道具。

所以一开始，新文化运动就是以骂战起家的。钱玄同可以说是这场骂战中的急先锋，他神经衰弱，体弱多病，却又慷慨激昂，话多而急，甚至走到哪里，骂声就传到哪里。三十来岁的他正是年轻气盛，有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闯劲，为了拉人写稿子，四处奔波。当时鲁迅窝在绍兴会馆抄古碑，心灰意冷，钱玄同每天下午四点去，一直在他那坐到半夜。鲁迅受到激励，写了《狂人日记》，发表在《新青年》1918年4月号上，打响了反对封建礼教的第一枪。

《新青年》编辑部里一部分人秉承骂人有理的原则。钱玄同将旧派骂作是“选学妖孽、桐城谬种”，陈独秀因此对钱玄同非常看重，因为一个古文大师跑来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，他觉得“莫名钦佩”。陈独秀本人也是非常强硬的，他认为自己的主张就是真理，是“绝对之是”，至于反对意见，“唯有痛骂一法”。

虽然胡适在一旁弱弱地表示：“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”，但这和平的意见被旁人激烈的呐喊声给淹没了。不过，不同意见都掐死，虽然极端激进，却是卓有成效。《新青年》开启了中国语言新时代，白话，标点符号、阿拉伯数字、左起横行书写等一一出现，开一时风气。更重要的是，德先生、赛先生、民主科学的思潮从北大起，席卷中国。

## 密议除陈

在如火如荼的运动背后，却隐藏着重重危机。

首先是，旧派们坐不住了，林纾率先发难。其实也不怪这位老爷子，平白无故躺枪，不起来骂两声怎么行。所以1919年春，林纾在上海《新申报》上发表文言小说《荆生》，影射攻击《新青年》的编辑胡适、陈独秀、钱玄同等，掀起了一轮骂战。

在反对派眼中，《新青年》是一个必须攻破的阵地，而首当其冲的，就是校长蔡元培和那几个编辑。在这些人里面，陈独秀是《新青年》的领袖，同时文章言语激烈，为人我行我素，性格张扬，特别容易招人记恨。

本来，蔡元培请陈独秀来北大是为了整治风纪，他认为陈独秀是道德的楷模。但是，陈独秀的私生活混乱，喜欢逛八大胡同，去嫖娼喝花酒。渐渐的，他的这个作风被广为流传，恰好被反对派们抓住了把柄。一些报纸大张旗鼓地报道陈独秀嫖娼事件，甚至传出他跟学生为同一个妓女争风吃醋，抓伤了妓女的下体等不堪入目的新闻。

此时是1919年3月，距离“五四”运动仅仅两个月时间，北平暗流涌动，风声鹤唳，在这个骨节眼上，陈独秀的嫖娼事件引起轩然大波，社会舆论瞬间指向了北大。

校长蔡元培陷入两难境地，国会议员张元奇向国会弹劾蔡元培纵容陈独秀嫖娼。1919年3月26日晚，蔡元培来到医专校长汤尔和家中，和沈尹默、马叙伦等人秘密开会，商议对策。这几个人都认为陈独秀私德太坏，不可姑息，劝说蔡元培弃用陈独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汤尔和和沈尹默曾经向蔡元培推荐过陈独秀。

这个会议一直开到午夜十二点。在内外夹击下，蔡元培做出了一个不甚高明的决定。他在4月10日的全校教授会议上宣布：北大废除学长制，改而成立由各科教授及主任组成的教务处，这相当于免去了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位。虽然他仍然给陈独秀保

留了教授职位，但却给他放假一年。自此，陈独秀被排挤出北大圈子。这次会议逐了陈独秀，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，也“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”。

## 分道扬镳

这件事情过后不久，“五四”运动就爆发了。学生运动的热潮席卷京城，陈独秀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6月11日，陈独秀在北京南城的新世界散发《北京市民宣言》时被捕，9月16日被胡适等人保释出狱。随后，陈独秀带着自己的《新青年》到了上海，哪里来的，又回哪里去了。

自此，陈独秀的思想愈发左倾，《新青年》成为宣传共产主义的重要

扫码看视频——对话蔡元培



记者：蔡校长，听说您曾七次辞职，现在大学校长都是省部级干部，没听说谁主动辞职。

蔡元培：不是有县长回乡种地吗，公务员不都排队等辞职吗，我看大学校长也可以排起队来。一百年了，你们就没点长进！我一直说，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。如果你想做官发财，来大学干吗？这些话都喂了王思聪家的狗了！

阵地。到了1921年，胡适请了《新青年》的九位同人投票决定是否要将《新青年》再度迁回北京，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，只有钱玄同认为应该分裂，两地各办各的。

而陈独秀给这个决议的回复是一封写给胡适的分道扬镳声明。他让北大的同人们另外去办一份报纸，坚决不把《新青年》迁回北京。但是他却转给鲁迅、周作人写约稿信，说北京的那些人不肯写稿子了，还得求助于您两位。

北大与《新青年》的缘分自此结束。《新青年》从1920年开始由陈独秀一人主持，9月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，1926年正式停刊。

而当时的“四大台柱”也自此分道扬镳。胡适与陈独秀的思想正式决裂，两人虽然私交一直很好，但是观念南辕北辙，陈独秀去干共产主义，胡适抱紧自由主义的招牌。而刘半农早在1919年1月就退出了《新青年》编辑部。他与胡适闹了矛盾，胡适嫌他不是科班出身，骂人轻佻刻薄，有点看不上他。刘半农便出国留学六年，拿了个博士学位回来，成为语言学大家。钱玄同此后继续致力于“国语运动”，直到1939年脑溢血逝世。

将他们聚拢在北大的最大功臣——蔡元培，也一直在辞职和复职之中徘徊，从他当校长开始，一共辞了七次职，每次辞职后，备胎蒋梦麟就被推出来当代理校长。五四运动时，蔡元培到处去救被捕的学生，5月8日，蔡元培向总统徐世昌辞职，当晚离京，直到9月才被大家给请回来。1922年10月19日，北大少数学生反对征收讲义费闹，甚至攻击蔡元培，蔡元培觉得自己平时没有教育好学生，玻璃心又碎了，当即宣布辞职。1923年，蔡元培抗议北京政府的官僚行为，最后一次辞职。

而蔡元培的最后离职，也几乎与新文化运动的落幕时间相吻合。他的离去，从某种程度上讲，为北大战场的斗争画上了句号。

文化人

齐鲁晚报

B02

一九一五，风云会

编辑：张洪波 美编：石岩 组版：颜莉

2015年11月5日 星期日